兽面形玉饰件

金车饰片

陕西宝鸡下站遗址

畤祭是秦的祭祀传统，始于秦立国时襄公所设西畤。秦文公东进关中后，秦在雍（今宝鸡地区）先后设鄜畤、密畤、吴阳上畤、下畤，分别祭祀白帝、青帝、黄帝和炎帝，合称“雍四畤”。汉初，刘邦定鼎关中，“悉召故秦祝官”，承秦制，于雍增设北畤，祭祀黑帝，与秦四畤一起统称“雍五畤”。随着秦、汉帝国的统一，“雍五畤”祭祀由封国祭祀逐渐发展演化为秦、汉帝国时期最高等级的国家祭天郊祀大典，直至西汉末年才被废止，其祭祀仪轨经过改造融入到都城南郊圜丘祭天祀典中。

201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在宝鸡地区开展“秦汉雍五畤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陆续发现血池、吴山、下站和蔡阳山四处祭祀遗址。目前已经对前面的三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得了丰富的祭祀实物资料，其中尤以下站遗址的祭祀遗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

下站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磻溪镇下站村，地处秦岭北麓渭河南岸的台塬之上，台塬东西两侧为冲沟，呈南北狭长形，长约4.3公里，宽600~800米，北侧塬边距渭河河道约800米。遗址位于台塬中部，总面积23万平方米，向北正对秦都雍城遗址，二者相距约21.8公里；同时遗址与吴山、血池遗址均互在视距之内。2017年，对遗址进行了初步调查，在遗址断面上发现了祭祀坑，采集到秦汉时期的绳纹瓦片。2018年组织大规模勘探。勘探初步明确了遗址的范围和遗迹分布情况，共发现各类祭祀坑1400余座。遗址中心区是约2000平方米的建筑砖瓦堆积区，各类祭祀坑围绕建筑区分布，其东侧为平行排列的南北向长条形坑，长方形祭祀坑分布在西侧，二者在遗址中部存在叠压打破关系。

为进一步揭示下站遗址祭祀遗存内涵及遗址布局，明确遗址年代，2020年至202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联合考古队对下站遗址进行了3次主动性考古发掘，共揭露面积2400平方米，清理灰坑数十座，半地穴房址3座，各类祭祀坑99座，其中尤以祭祀坑的收获最大。2020和2022年的发掘主要是围绕中心建筑区展开，目的是解决畤祭祀建筑的形制问题，但是很遗憾我们并没有发现建筑基址，反而是收获了大量种类丰富的祭祀坑、动物牺牲、祭祀遗物和秦汉砖瓦建筑材料。祭祀坑之间存在丰富的叠压打破关系，出土祭祀遗物的年代特征明显，初步建立起了春秋至汉代畤祭祀遗存的年代框架。2023年的发掘，我们又解决了下站遗址祭祀用玉的组合问题，并进一步完善了祭祀遗存的年代序列。

文献记载畤祭在不同时期的礼仪和祭祀用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秦文公、德公时以“牢”祠鄜畤，其后祭祀逐渐复杂化并向规制化演变，祭祀用物由单一的“牢”演变为使用“畤驹四匹”“黄犊羔各四”，即马、牛、羊幼年个体各四；还有“路车一乘”、“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珪币等，无俎豆之具，生瘞埋，即祭品不用容器或盛器装盛。下站遗址三年发掘清理的各类祭祀坑99座，牺牲与车马皆瘞埋，不出容器和盛具，与文献记载一致；祭祀坑类型也与文献记载基本一致，按形制和埋藏物不同可分为三大类、11个小型。第一类是长条形坑，年代最早，属于春秋中期，按照坑的长短又可细分为两种：一种为平行排列的南北向长条形坑，宽0.5~0.6米，长百余米。坑内主要埋藏牛，皆头向北，排列紧密，摆放较有序。在牛之下，每隔一段距离还埋藏一只羊。另一种为平行排列的南北向窄长形坑，形制及动物牺牲种类与Aa型祭祀坑相似，唯长度较短，宽0.5~0.6米，长5~10数米不等。长条形坑的牺牲与文献记载文公、德公以牢祠鄜畤正相吻合，牢的甲骨文写作牛的外围有方形设施，本义或指用牛祭祀。第二类，长方形坑，打破长条形坑，年代晚于春秋中秋，根据坑内埋藏遗物不同又可分为动物牺牲坑、车马祭祀坑和模型车马祭祀坑三种。

动物牺牲坑又可细分为马坑、牛坑和羊坑。

马坑，东西向长方形坑，坑底摆放4匹幼马，头向东，摆放较有序，即文献所载“畤驹四匹”。牛坑同样是东西向长方形，形制较马坑略大，打破马坑，坑底摆放4头小牛，摆放稍乱。羊坑也是东西向长方形，形制较马坑略小，坑底摆放4只羊。牛坑与羊坑的发现与文献记载“黄犊羔各四”也是完全一致的。

还有一类长方形祭祀坑比较特殊，东西向长方形，形制与马坑相当，但坑底无遗物，我们暂定为空坑，目前仅发现1座。

文献记载的车马坑，下站遗址也有发现，自春秋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一直存在，但不同时代，祭祀坑和车马的形制皆有明显区别，根据坑的形制、大小可分为三类。最大的是一种超大型车马祭祀坑，长8.7、宽7.9、深度超过12米，目前已发现1座，体量相当于其他车马坑四个大小，坑内应可放置四辆车。出土金、玉、铜质车马器，金鸟和金端饰是其中比较精美的。其次是一类大型车马坑，长约4米，均被盗扰；坑底清理出木头搭建的痕迹，判断坑底应放置木箱，木箱内放置车马一乘。出土车马器及饰件有兽面形玉饰、金虎、金节约、玉环、玉鱼、方形玉牌饰等。车马器形制与秦公一号大墓车马坑出土的车马器几乎完全一致，表明该类车马坑的年代属于春秋中晚期，等级非常高，与国君相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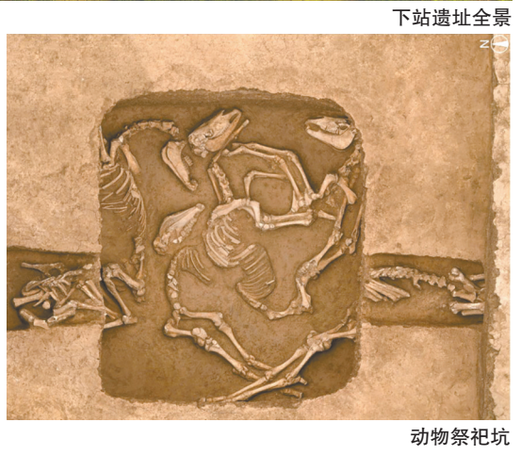
车马坑到战国、秦汉时期，形制规模逐渐缩小，但埋藏形式未变，仍旧是在坑底木箱内放置车马一乘，部分车上髹红漆且有精美蓝色彩绘。出土车马器的组合形制发生了较大变化，增加了在车舆放置玉人、玉璜、玉琮、弩机、箭镞等新的元素，该类型车马坑在血池与吴山遗址均有发现。以上三类车马坑使用的都是真车马，可能就是文献所载“路车一乘”。

还有一种长宽比特别大的长方形祭祀坑，长度大于4米，目前仅清理2座，坑内出土玉人、玉璜和模型车马器构件，未见车马原物，可能是构件寓意模型车马。

第三类是竖穴洞室型祭祀坑，洞室内放置模型车马，部分模型车配置伞盖，伞盖边缘垂坠铜铃。文献记载雍五畤有使用“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祭祀，栾车即带有铃的车。所以推断配有伞盖的车可能就是木禺龙栾车，没有伞和铃铛的车应为木禺车。从出土器物判断，此型祭祀坑年代约为战国至秦汉时期，年代较秦汉时期方形车马祭祀坑略早。

除牺牲、车马外，文献记载雍五畤祭祀还使用“珪币各有数”，这里的“珪币”应是玉器等祭祀物品的统称。下站遗址收获祭祀遗物的种类丰富多样，包括春秋时期金、玉、铜车马器，秦汉时期玉人、玉琮、玉璜祭祀玉器组合及大量铜质车马器，铜弩机、箭镞等，还包括玉圭、玉璧残件等其他玉器、钱币等。建筑使用的云纹瓦当、文字瓦当、砖瓦等建筑构件也大量出现在遗址中。刻划“密”字陶文的陶片为遗址的性质提供了文字证据。

下站遗址全景



动物祭祀坑

洞室坑

玉人（男）玉人（女）

春秋时期，车马坑中出土的金器造型和纹饰都是典型秦式的，比如金虎、金鸟和金节约上的蟠虺纹；也有部分可能是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比如金H形节约上的浅浮雕动物纹饰。出土玉器的造型和表面纹饰也是秦春秋时期比较典型的，兽面玉饰、回首虎以及玉策上细密的蟠虺纹均有明显的年代特征；还有方形玉牌饰、竹节形绳扣和玉鱼等在秦公一号大墓二号车马坑均有较多出土，表明二者的年代相当。战国至秦统一时期，使用的祭祀物品较春秋时有了较大变化，逐渐形成了玉人、玉璜、玉琮的固定组合，车马器也形成了统一规制，新增加了弩机和箭镞等在祭祀坑中，并且出现了模型车马器。汉代建立以后，雍五畤祭祀完全承袭秦的仪礼和用物，祭祀用玉和车马器组合继续沿用。自汉文帝始，西汉诸帝均不同程度郊祀雍五畤，以汉武帝为最多。雍五畤祭祀随着汉代上层思想的变化不断发展演变，祭祀用物也随之增减。建筑区附近还出土了大量砖瓦建筑材料，多数瓦当涂朱，表明建筑比较讲究、等级较高。

下站遗址的年代，通过类型学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下站遗址大型车马坑出土遗物与毛家坪M2059车马坑和秦公一号大墓车马坑出土遗物形制基本一致，年代相近，应属于春秋中晚期。此外，采集祭祀坑动物骨骼做C14测年，数据显示长条形坑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700至公元前500年，马坑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500至公元前400年，牛坑和羊坑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100年。综合牺牲坑与车马坑之间的打破关系我们初步可以建立春秋至汉代下站祭祀遗存的年代序列，同时也证实了文献关于密畤建于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的记载。

结合文献和出土遗迹、遗物分析，春秋中期密畤祭祀坑主要为南北向长条形，坑内主要埋藏牛牲；春秋晚期祭祀以东西向长方形为主，除动物牺牲坑外最重要的是出现了车马坑，坑内埋藏实用车，车马器形制与秦公一号大墓二号车马坑出土车马器几乎相同，明确了祭祀坑的年代和等级；战国时期车马坑形制缩小，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实用车开始向模型车转化，并开始在车舆内放置玉人、玉璜和玉琮，这种玉器组合一直延续至西汉时期。洞室祭祀坑是战国至秦汉时期新出现的类型，洞室内放置偶车马。

结合文献记载，根据对下站遗址出土祭祀遗存的分析初步有以下几点认识：

下站遗址的祭祀坑数量庞大、内涵丰富，祭祀坑类型与祭祀遗物与血池遗址、吴山遗址具有较多共性，表明下站遗址与血池、吴山遗址性质相同，皆为畤祭祀遗存；且据《史记》记载渭河南岸仅有一处畤，即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所设密畤，再加上遗址出土“密”字陶文，明确了下站遗址即是秦汉时期雍五畤之一的密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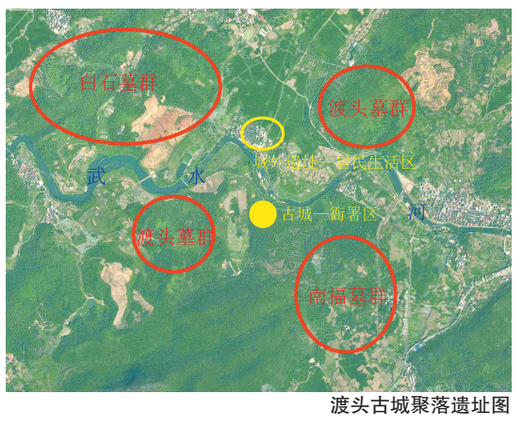
密畤从公元前672年建立到西汉末年被废，前后延续使用时间长达六百余年，是研究先秦至西汉时期祭天礼制及其演变最为完备的实物材料；目前已经发现的不同时代的各类祭祀遗存，已为我们初步建立起了秦汉国家祭祀遗存的分期年代标尺。

下站遗址结构布局清晰，各类祭祀坑围绕中心建筑区呈规律性分布，年代相近、类型相同的祭祀坑之间无叠压、打破关系，表明国家对畤的结构形制有严谨规划。下站遗址保存完整，其发掘收获将为探索畤乃至秦汉时期祭祀性遗存的结构形制提供难得的实物材料。

下站遗址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秦汉时期性质最为明确、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国家祭天遗存，伴随着帝国统一，雍五畤由地方国家祭祀升级为统一帝国的祭天祀典，延续约200年，是中国古代祭天礼制发展的重要阶段。“雍五畤”的形式虽然在汉末被废止，但是内容却为都城南郊天坛祭祀所吸收，成为后来中国传统天坛祭祀的一部分，影响深远。

（中国国家博物馆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宝鸡市考古所 陈仓区博物馆 执笔：游富祥 卢一 王凯 郝怿 赵梦瑶 张若衡 郭苏慧）

湖南临武渡头古城遗址



渡头古城聚落遗址图

简牍记载郡县和签牌

出土建筑遗物

渡头西汉墓出土陶鼎、盒、壶

渡头古城遗址位于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汾市镇渡头村武水河南岸，西南距县城约13公里。2016年至2023年，按照“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重大项目部署，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郴州市博物馆、临武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对渡头古城遗址开展了系统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

根据发掘计划，先后在护城壕、城内、城外遗址区及周边白石和渡头墓群开展了长达7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取得重要收获。

地层堆积和清理遗迹

渡头古城遗址地层堆积厚薄不一，古城城门处地层堆积较薄，厚0.5～0.8米，城内、护城壕内地层堆积较厚0.8～3.8米，城外生活区地层堆积较薄，厚0.8～1.2米。

2017年至2023年，先后在城址以及墓葬区，发掘出护城壕、灰坑、灰沟、房址、柱洞、水井、道路、墓葬等各类遗迹360余处。

重要收获及初步认识

聚落面貌 通过多年的系统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确认渡头古城遗址是一处以渡头古城址为中心并包括了周边墓群、矿冶遗址的古城邑聚落遗址，分布面积近32万平方米，年代为汉至六朝时期。

结合出土吴简、历史文献和城址位置及文化内涵，证实渡头古城遗址是汉至六朝时期临武县治所在地，其中古城是临武县衙署区，城址外东北遗址区是普通居民生活区，城外西北部矿冶遗址为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区域，古城周边墓群是重要的埋葬区。

营建方式 渡头古城地处武水河南岸一处低缓的山岗上，遗址旁边有一条古道经过。现存城址（衙署区）平面近方形，北墙正中有一门，城址东南有一角楼相连。古城选址建在水路与陆路交通的交汇地带，其营建方式是先将山顶削平或填平，然后将山顶四边修成陡壁，并挖有壕沟，使城外地面与城内形成较高的落差，起到类似城墙的效果。这种城址与地面建有较高的夯土城墙、但与城墙内外地面落差不大的城址有明显的差别。类似的城址在岭南地区有较多发现，如广东的五华狮雄山城址、广西的勒马古城。

总体来看，渡头古城是一座“山城”，其依地势而建，属于比较典型的“岭南型”城址。

修建过程 在城墙外揭露出两条不同时期的护城壕，晚期城壕较宽，早期城壕略窄，且晚期城壕打破了早期城壕。通过城壕的解剖，基本明确了城址始建于西汉中期，孙吴时期有一次大的重修，重修时城址面积较汉代缩小，且在城址东南角修建了防御性质的角楼。

办公建筑及道路 通过多年的发掘，在城址中部较完整揭露了一座六朝时期的大型建筑F2，平面呈长方形，坐东北朝向西南，南北长22米，东西宽8.5米，门道宽约5米。房址位于城址中部偏东，房址基槽内铺有青砖，房内有砖井J1，门道外与道路相连。房址基槽、门道、道路、水井、活动面等保存较好，初步判断该房址为六朝时期重要的衙署办公建筑。

在城内、北城门外均揭露有道路遗迹。城内道路与城外道路基本相通，应是城址的一条主要道路，系用碎陶瓦、残砖以及鹅卵石铺设而成，残宽0.8～1.2米，残厚0.06～0.2米。发掘道路位于城址中部，是城内通向城外的重要道路，也是渡头古城控制水路、陆路交通的重要通道。

城外墓地 墓地分布在城外四周的低矮山岗上，可分为白石、渡头、南福三个大的墓群，其中渡头墓群又分为公公坪墓区和三星赶月墓区。从调查和发掘情况来看，周边墓群是在不同时期形成的，其中南福墓群、渡头公公坪墓区主要为西汉时期墓葬区，而白石墓群、渡头三星赶月墓区主要为东汉至六朝时期墓群。

2017年至2023年，先后在渡头、白石墓群发掘西汉至六朝时期墓葬21座。墓葬多位于低矮山岗山腰东南或西南。墓葬葬于网纹红土中，棺椁、人骨腐朽无存。

西汉墓葬11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墓葬大多呈东北西南向。出土陶器组合以鼎、盒、壶或鼎、盒、罐为主，有少量铜器、石器。在渡头公公坪墓区发掘了一座带过洞式斜坡墓道的夫妻同穴合葬墓。合葬墓出土有陶鼎、陶盒、陶钫、铜矛、漆器、环首铁刀、四联罐，年代为西汉晚期。从墓葬形制来看，可能来自中原，但墓葬随葬品还包含了岭南常见的四联陶罐。

东汉墓7座，主要见有带斜坡墓道的刀形竖穴土坑墓和平面呈“中”字形的砖室墓。砖室墓多由墓道、封门、前室、后室组成，部分墓葬有排水沟。墓砖多为青砖，另有少量红砖，烧制火候较低，多见菱格纹。墓葬被扰严重，出土残存器物数量较少，见有陶器、铜器、银器、铁器、串饰等。

晋代墓葬3座。平面呈“凸”字形，由墓道、封门、前室、后室组成。出土有陶器、青瓷器、铜器、银器、铁器等。墓砖基本为青砖，纹饰多为菱格纹，基本沿袭东汉墓纹饰风格。

城外矿冶遗址 在渡头古城遗址西北约10公里山区发现一处东汉至宋代矿冶遗址，冶炼遗址面积近15万平方米，遗址堆积较厚，在炉渣中采集到较多的东汉至六朝时期遗物。

出土遗物 通过连续多年的发掘，在城址和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遗物，城址、墓葬出土遗物有陶器、青瓷器、金银器等各类文物标本500余件，各文化层和遗迹出土遗物差别较大，时代特征明显。遗址出土陶器主要有建筑遗物和生活用器，建筑遗物有瓦当、板瓦和筒瓦，生活用器有陶罐、盆等。墓葬出土陶器有鼎、盒、壶，模型明器等，还有少量的铜镜。其中最重要的是2022年至2023年，在古城内中部及西北部清理了两口古井J1和J2，共清理出近1万枚简牍。

水井概况及出土简牍 J1为砖砌井，位于房址F2内北部，井口平面呈圆形，直径约2.4米，井壁竖直，经修整，井深13.35米。砖砌七边形井口，直径约1米，顺丁相间成圈，以七块长方形砖横立对接，在两砖结合处插以侧立长方形砖，朝向井心呈齿轮状，上下层砖之间逐层错缝相叠砌，自11.9米开始，砖井井体开始向内收缩，至底部直径约为0.7米。J1所用井砖多为条形青砖，红砖较少，另见有少量楔形砖；砖上有绳纹、菱格纹、叶脉纹等。

渡头三星赶月墓葬发掘航拍

渡头古城遗址F2、J1和L1

出土人面纹瓦当

J2出土吴简

出土生活用器

J1清理出有字简牍120余枚，无字简牍2000余枚。出土简牍发现有“嘉禾元年”“嘉禾五年”文字，“嘉禾”为东吴孙权的年号，初定为三国吴简。吴简包括木简、木牍、签牌、封检、削衣等，内容大致为经济券书、账簿、名刺、书信等。

J2位于城址内西侧偏北，为竖穴式土井，口大底小，口径约3.7米，深度12.2米。J2内填土堆积自上而下分为12层，出土有大量的陶器、青瓷器残片以及简牍，另有少量砖块、瓦片及动物骨骼。陶器见有罐、釜、盆、钵、碗及少量板瓦、筒瓦等；青瓷器见有罐、钵、碗、器盖、瓶等。简牍集中出土于J2⑩层堆积，该层位中还伴出大量的竹木制品。

J2出土简牍较J1保存相对较好，现清理出有字简约1500余枚，无字简约7000余枚。

J2出土简牍不仅出现“嘉禾”，还有“黄武”“黄龙”等孙权的年号，包括木简、木牍、签牌、封检、削衣等。J2出土简牍内容与J1出土简牍内容基本相似，涉及赋税、户籍、屯田等，简文中还出现临武“锡”矿的记载。

渡头古井出土简牍有纪年，年代明确，确认为吴简。包括木简、木牍、签牌、封检、削衣等，内容丰富，涉及赋税、户籍、屯田、郡县、矿冶、乡里等等，多见佃田租税和各官署机构调拨物资的券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缴纳租税的经济券书，详细记载了征收物品的种类、时间、交付人及接收者等相同信息。简文还有中间书有一个“同”字符号，再被剖分成三份或两份，分别保存，古称“莂”，今为“合同”，简文记载“临武”及其辖属乡里情况，并涉及“郴”“长沙”等郡县往来文书资料。通过简文可知渡头吴简是三国时期吴国临武县的官府簿籍档案。

出土陶器与聚落分期、年代 根据地层叠压、打破关系、出土遗物特征以及纪年简牍，可初步将渡头古城聚落遗址分为四期：第一期：遗址以2017 HG7、2023 HG2为代表，墓葬以2022年发掘的公公坪M1、M4、M5、M8为代表。遗址出土粗绳纹板瓦、涡纹瓦当以及短颈陶罐。墓葬出土陶器组合有陶鼎、盒、壶、罐、钫等，年代为西汉中晚时期。第二期：遗址以2017年发掘文化层⑤⑥⑦⑧层以及2017年发掘H40、H41，2022年G10为代表，墓葬以2021年发掘的公公坪M7，三星赶月M1、M2为代表。年代为东汉时期。第三期：遗址以2017HG6、H30、H31、2023 HG1为代表，墓葬以周家坪M1、寺冲M1为代表，年代为两晋时期。第四期：以2017年发掘区文化层②③④层、2019年发掘区文化层②层，以及2017年发掘G4、H7为代表，出土器物以薄板瓦为主，另有青瓷钵、罐和花瓣纹瓦当，年代为南朝时期。

价值阐释

渡头古城遗址是湘粤古道上仅有的一处保存完整的古城邑聚落遗址，是汉至六朝时期我国南岭地区古代城市的重要代表，渡头古城遗址考古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渡头古城遗址的选址、形制、布局和聚落结构等为研究汉代至南朝时期南方地方城市的发展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包含的多元文化因素等为研究南岭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交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例证。

渡头吴简是湖南简牍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是继长沙走马楼吴简之后，国内出土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吴简，为研究孙吴时期社会、经济、历史、地理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遗址周边深坪岭矿冶遗址的发现和出土简牍中“锡”等物产的记载，为研究南岭地区有色金属资源的开发提供了重要资料，为中国古代冶金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渡头古城聚落遗址连续使用时间长、年代跨度大，出土遗物丰富。它的发掘构建了南岭地区汉至六朝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序列，为研究古代中央政权对南岭地区的开发和有效治理提供了重要资料。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执笔：陈斌）